

## 社会规制决定数字门槛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邱泽奇

数字鸿沟的核心是数字隔离。导致数字隔离的主要因素是数字素养差异,数字门槛的高低形式上是技术决定的,本质上则是由社会规制规定。

代际数字鸿沟是技术门槛的设置忽视了年龄之间的技术素养差异,自然地把技术素养较低的老年人排斥在了技术应用之外。如今在中国看到数字鸿沟其实是数字红利鸿沟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应用不能借助家庭文化进行数字红利分享,真正的、以个体为单位的数字红利鸿沟开始显现出来。

应对代际数字鸿沟的核心还在科技向善。

一是在技术上,需要反复坚持倡导科技向善。在当下,产品的向善刻不容缓。在产品层次,亟需保障产品的普惠性,比如各种“码”易用性的覆盖面。简单地说,是降低技术门槛,实现技术普惠。降低技术门槛毫无疑问会增加企业成本,可是,却也为社会带来收益,获得社会整体收益的“帕累托改进”,即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,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。

二是在制度上,在社会规制层次需要把社会需求转化为制度。为什么会有大量代际数字鸿沟的案例成为热搜?热搜呈现的正是社会需求。如果技术发展一骑绝尘,完全忽视技术应用的社会覆盖性,社会就需要启动规制机制,把社会的需求上升为社会规制。其中,政府需要扮演社会守门人的角色,而不能推波助澜,让技术沿着资本逻辑狂奔。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非常必要,它能推动社会的创新。社会对市场的规制同样必要,只有社会表达对市场规制的需求,才可以倒逼政府制定必要的政策,使制度成为数字红利普惠不可或缺的一环。